

契约华工制的历史分期问题

王启民

契约华工制是西方殖民者招募骗掠我国劳动力的一种形式。从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实行了一百多年,出国契约华工约三百万人。

殖民者在招募骗掠契约华工的过程中,使用了极其卑鄙残暴的手段,在国外又对契约华工进行非常残酷的剥削和压迫。这在资产阶级文明史上,是继奴隶贩卖之后的又一罪恶行径。

在国外的契约华工和国内人民对此曾进行过长期的斗争,并成为中华民族反对殖民主义斗争历史的组成部分。

学术界对契约华工制的历史分期问题,还没有展开过讨论,本文拟作一些初步探讨,以就正于同志们。

一

契约华工制开始出现于18世纪末,到1840年鸦片战争前,大约半个世纪,是契约华工制的第一阶段。

这时欧美一些国家,产业革命先后开始和发展,殖民国家对亚非拉人民的掠夺,从资本原始积累阶段转上商品大进军阶段,即把殖民地半殖民地变为它们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殖民者迫切需要大量劳动力。这时候,在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政治腐败,土地兼并严重,社会治安不宁,广大农民、手工业者及其他下层人民,“终岁勤劬,十不获五”,“又困于徭役,财产窘乏,大异夙昔”,^①许多人被迫出洋谋生,以广东福建人最多。

东南亚地区是殖民侵略的一个重点。英国在加紧掠夺印度的同时,逐步扩大在马来亚的殖民势力。荷兰东印度公司于1800年解散,印度尼西亚归荷兰政府直接统治。东南亚盛产热带和亚热带经济作物,其中如香料、咖啡、蔗糖等都进一步纳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随而种植园经济日益扩大,矿山也开采起来,都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在殖民者看来,华工工资低,能吃苦,是很好的剥削对象。他们不仅从当地华侨中招工,而且还进一步直接从中国国内招取劳动力。

契约华工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

西方殖民者中英国东印度公司首先采用契约华工制。18世纪末,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殖民地庇能(檳榔嶼)的总督“连年通过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广州的代表招雇中国工匠和农夫,用公司的船只送往庇能”。^②1804年底能总督乘当地华侨甲必丹^③回华的机会,委托他在广东

省招雇华工，并且函嘱公司驻广州代表为他准备资金。④

运到底能的华工是什么待遇呢？是什么性质的华工呢？“（中国）移民们乘帆船来到本岛（属庇能管——引者），他们把自己的身体‘押当’船资和为数约西班牙银洋二十元的伙食费，这笔钱由种植园主垫出，而从工人的工资中按月扣还”，⑤并称这样的劳工为 *indentured labour*（契约工）。但根据其它材料，这二十元应是指船资和伙食费的合计数，而不是单指伙食费。1800年底能市上已出现转让契约华工，每个立有佣工一年契约的华人可值西班牙银洋三十元。⑥这种华工与出国华侨以及当地招雇的华工有什么区别呢？第一，他们的船费和伙食费是由东印度公司代表筹垫的，而不是自交的；第二，他们到达目的地后，与华侨不同，无选择职业的自由，甚至没有人身自由，必须按照合同在种植园或其它企业做工满一定的期限；第三，种植园主或其他雇主付还东印度公司所垫的费用，华工的船费和伙食费则在工资中按月扣除；第四，公开行情是每个契约华工值三十银元。可见，除了船费、伙食费外还有十元左右的身价，雇主付还所垫的船费、伙食费并付出身价，另付少量工资，这是奴役他们的经济前提。再从人数来说，根据当时市上已出现转让行情，可断定不是少数，连年载去，应有相当的数目。

总的说来，具备契约华工制基本特点的历史上的契约华工制出现的时间是在18世纪19世纪之交，出口地点最早是广州，到达地点首先是在马来亚的庇能。最早采用这种劳力招募形式的是英国殖民者。

由于清廷实行闭关政策，外国在中国招募工人，是违法的，殖民者只好偷偷摸摸地进行，好象早期的鸦片走私一样。运载契约华工的次数多了，必将引起清政府的注意，地方官吏又乘机勒索，增加招募的麻烦。因此，英国东印度公司除广州外，还利用葡萄牙人盘据下的澳门，而且澳门后来居上，成为运出契约华工的中心。庇能不仅本地使用契约华工，而且由于其他地方也急需劳力，它成为一个转运站。它和以后的新加坡（1819年被英国占领）遂成为契约华工的转运中心。就在第一阶段，契约华工所到的地方，除庇能和马来亚外，19世纪初爪哇也有了契约华工。拿破仑1815年被流放到大西洋上圣赫伦那岛时，岛上已有该岛英国总督运去的中国契约工人。此外西印度群岛、巴西等地区也都有了契约华工。

还必须指出，在契约华工制的第一阶段，19世纪二十年代，出现了卖“猪仔”的事。卖“猪仔”是契约华工制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在这阶段它还不是契约华工的主要形式，但它标志着招募华工进一步走上骗掠拐绑的道路。有的把“猪仔”与契约华工完全等同，把所有的契约华工都叫“猪仔”，是不精确的。卖“猪仔”是契约华工的一种形式。“猪仔”是契约华工的一类。

二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七十年代末，是契约华工制的第二阶段，是它的高峰时期。

为什么会出现契约华工制的高峰呢？

从国内来说，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大门被打开了，自然无法阻止人口汹涌出去。同时清政府也看到不许人民出洋，而人民又无以为生，反而会激起更大的不满和反抗。它虽然没有公开取消禁令，实际上却听之任之，所谓“前例已不废而自废”。⑦1858年的“天津条约”

和1860年的“北京条约”，迫使清政府正式取消了关于出洋的禁令，殖民者取得合法招运中国人出洋的特权。契约华工出国与一般华侨出国有区别又有联系，契约华工制的高峰就是在出国人口高潮的形势下出现的。

从国外来说，殖民主义对亚非拉的侵略，仍是自由资本主义殖民政策的时期。产业革命在有些国家已经完成，在有些国家正在迅速开展。越来越多的地区，包括广大亚非拉地区，被拉入资本主义市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终于完全形成了。无数的矿山和种植园，许多的建设工程，都急需大量劳力。如拿律大锡矿、印尼的锡矿、烟园、胡椒园、棉园；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澳洲维多利亚，新西兰的奥托沟，都发现了金矿；美国加里福尼亚的金矿，美国太平洋铁路的修筑；秘鲁的矿山和鸟粪层；西印度群岛和南美洲的古巴、特立尼达、马丁尼克、圭亚那等地的蔗糖园。……都急等着输入劳力。

同时，奴隶制的逐渐衰落以至最后废除也是影响契约华工的一个重要因素。中美南美一带原来都盛行奴隶制。奴隶不断的反抗和斗争，给奴隶制以沉重的打击。拉丁美洲外的其他地区的奴隶也以英勇的怠工、破坏和暴动，猛烈地冲击着奴隶制，使奴隶制经营成为不一定合算的事情。1833到1870年间，英国、法国、秘鲁、美国、荷兰、西班牙先后宣布废除奴隶制。奴隶制废除后，急迫需要大量劳力，而自由劳工不能满足需要，特别是自由华工工资要高一些，来去自由，又常常搞工人组织，闹罢工，比较起来还是使用契约华工最为有利可图，因为他们工资低，在合同满期以前是不能离开的，还可以施以种种超经济的强制和剥削。合同满期后，还可以采用种种手段使他们无法离开本种植园和矿场。

契约华工出国的高峰也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出现的。

在这阶段，契约华工制是如何发展的？它有什么新的特点？

鸦片战争后，华工出口岸已从澳门、广州扩展到香港、海口、广州、汕头、厦门、福州、宁波等地。在早期阶段已成为转运点的庇能和新加坡，现在仍然是重要的转运点，特别是新加坡的重要性已远远超过了庇能。这里有两种情况：一是从中国出口的契约华工运到新加坡或庇能后，再转贩到东南亚各地；一是从中国出国的自由移民，到新加坡或庇能后才沦为契约华工，运到别地。

这样，形成了契约华工的出口管，管口分插到北自宁波南达新加坡的各个口岸，殖民者从中源源不断地抽取中国的劳力。以厦门为例，1845年运走400名契约苦力到布尔邦岛。1846年运走121名契约华工到澳洲悉尼。1847年运走第一批前往古巴的契约工800名。1848年运走第一批前往秘鲁的契约工75名。以后又连年从厦门等地大批运去。1847——1853六年中，有记载可查的从厦门出国的契约华工是12,151人，平均每年约二千人。

鸦片战争前，契约华工所到地区，主要是东南亚，次为秘鲁、澳大利亚、美国、西印度群岛等。鸦片战争后，除上述地区的人数继续扩大外，契约华工又进一步到达古巴、加拿大、英属圭亚那、夏威夷群岛等地区。足迹所至，越来越广，即在同一地区也愈益深入于穷乡僻壤。

从1851至1875年的25年间，共有1,280,000名契约工出国。其中到马来半岛350,000名，东印度群岛250,000名，美国160,000名，古巴135,000名，秘鲁110,000名，澳大利亚55,000名，菲律宾45,000名，加拿大30,000名，西印度群岛及英属圭亚那30,000名，夏威夷群岛25,000名，南美哥伦比亚、巴拿马地区25,000名，新西兰5,000名，其它地区40,000名。

出国契约华工人数的猛增，出国口岸的增多，到达地区的更为广泛，成为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

鸦片战争后，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在第一阶段已经出现的“猪仔”制，恶性大发展成为契约华工的主要形式。当时关于“猪仔”的记述是很多的，其所以称为“猪仔”者，第一，从其来源来说，“或被骗，或被劫”，是“略卖人口”。第二，在运输途中，“关闭仓底”，“一入番舶，如载豚豕”。第三，到国外后，受尽各种虐役，“其惨有不可言状者”。当时“猪仔”人数很多，“动辄数十百人”，卖至各处，近在南洋，远达秘鲁、古巴诸国。

“猪仔”制恶性大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猪仔”馆的大量出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便已有一些类似“猪仔”馆的拘留集中所了。到六十七十年代，“猪仔”馆象毒菌般地发展起来。1876年时，仅汕头一地，就有“猪仔”馆二三十家，新加坡、庇能和印尼一些地方也都有好些“猪仔”馆。“猪仔”馆的出现和增多，表明“猪仔”需求量的大扩大、大增长，只有通过“猪仔”馆及其爪牙和运输网，才能诱拐到必要的“猪仔”数。它也表明，对“猪仔”的诱骗胁迫、绑掠私刑的罪行更加严重了。以开设“猪仔”馆牟取暴利之徒，都是些不择手段无恶不作的市俗流氓。他们唯利是图，惟洋人之命是听，对自己的“猪仔”同胞使用最卑鄙最野蛮的欺诈和迫害手段。“猪仔”馆的出现和蔓延也表明，不顾政府的禁令，贩卖“猪仔”已是公开的半合法的行动了。

为什么在鸦片战争后，“猪仔”制会这么猖獗起来？

从国外方面说，第一，对中国劳力的需要猛增，招募中国劳力的一般契约方式，已远不能满足需要了，而“猪仔”制可以大大加快供应的速度，扩大供应数量。第二，用“猪仔”形式可以把购买价、运输费用等压到最低限度，提高利润率。第三，以“猪仔”的身份到达目的地后，那就更没有丝毫自由了，雇主对他们的剥削和超经济强制更可以达到极限。

“猪仔”制所以能在中国沿海广大地区盛行，这又与国内的政治和经济状况有密切关系。中国劳动人民为生活所迫，走投无路，易于上当受骗。如果当时中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是可以加以制止或抑制，而腐朽的清政府害怕洋人，虽曾在个别情况下干预过“猪仔”制，但总的说来是没有加以制止的，禁令只是一纸具文，而且许多官吏还参与分肥，从“猪仔”贩卖中捞到油水。

19世纪中期，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华工，有很大一部分是在赊单制下出国的，称赊单工，如1852—1854年三年间共有4万5千人去美国，其中百分之八十是赊单工。赊单工究竟是自由劳工还是契约劳工？如果是契约劳工，与“猪仔”又有什么区别？对这问题，曾有不同的说法。我认为赊单工是契约华工制的一种形式。赊单工的旅运费不是自筹，而是由资本家预付，旅运费的垫付是剥削赊单工的经济前提。赊单工到达后，必须订立契约，工作若干年，这笔旅运费不仅要还，而且要付利息，由华工的工资中按月扣还，这种本利剥削甚至比一般高利贷还要严重。赊单工到达目的地后，在偿付本利的期限方面是比较自由些，不过，你欠得愈久，利息也愈多，这于华工并没有好处。赊单工在选择职业和工作地点方面比“猪仔”是自由些，但也是相对而言，至多是半自由吧了，到后来，赊单工越来越少，多数是自筹旅费赴美，这是自由劳工，而不是赊单工。后来美国排华，捏造了许多所谓理由，如反动分子加孙居然说：“彼等（指华工——引者）来美，半为办华工入口商会之产物。其居留之时，即为该商会之奴隶。”^⑥这完全不是事实，无论是赊单华工或自由华工，

从来都不是华侨商会的奴隶。

三

从19世纪七十年代末，到19世纪末年，是契约华工制的第三阶段，也就是契约华工制开始衰落的时期。这种趋势的表征是：第一，契约华工出国总数有了下降。从1876—1900的25年间，出国契约华工只有750,000人，只占前25年数的58%左右。从地区来说，有些地区，如古巴、秘鲁、圭亚那等地已停止了招募契约华工。第二，作为契约华工制高峰的重要标志的“猪仔”制，在这阶段已受到严重打击。清政府迫于社会舆论已在沿海口岸比较严厉地制止贩卖“猪仔”，有的“猪仔”贩甚至被处死。有一些国家与清政府签订的移民或华工条约中，明文禁止“猪仔”劳工。葡萄牙于1873年2月被迫声明，三个月后禁止从澳门装运“猪仔”出口。1877年马来亚颁布了移民条例，华工政务司有审查苦力订合同是否出于自愿的责任，不愿者立即遣回中国，工约（即合同）必须注册登记。第三，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区，国内情况有了变化，不再迫切需要华工，同时一些反动分子利用华工问题以达到其可鄙的政治目的。美国和加拿大从19世纪八十年代起，澳洲从九十年代起，先后掀起排斥华工的黑浪，赎单工制度也成为迫害和排斥华工的借口，并实施种种限制华工入境的苛刻条例，对华工进行残酷的驱逐和烧杀，契约华工和一般华工同样遭受迫害。从此，在这些地区，契约华工制基本上不存在了。

契约华工制为什么会开始转向衰落？“猪仔”制为什么会受到打击？对此曾有不同的解释。

西方国家及外交官员，摆出人道主义的样子，说什么“细思与贵国通商，贵在与民友好，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待之以礼义”。^⑨说什么马来亚政府同情被拐骗的华工，等等，这种伪善是骗不了人的。有的人夸大世界舆论的力量，把西班牙在古巴结束“猪仔”制说成是“由于激起全世界的义愤”的结果。^⑩舆论即使有些影响，那也极其有限，殖民者唯利是图，唯力是视，是不大把舆论放在眼里的。也有人归因于清政府与外国谈判的结果。他们说，是清政府派了大员陈兰彬去古巴调查，发表了调查报告，西班牙政府只得与中国谈判，才导致古巴“猪仔”制的结束。懦弱腐朽的清政府何曾真正关心过契约华工的命运，它的谈判究竟能起多大作用，这是不言自明的。有的则归结为历史的趋势。这种说法十分空洞抽象，不能说明问题。有的说是由于不再需要中国劳力了。这也没有接触到根本原因，有的地区，如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当时是暂时并不怎么需要中国劳力了，但它们的排华不仅仅是这个原因，还有其它的政治和社会原因，这里暂不置论。还有好些地区，如古巴，仍然需要中国劳力，却为什么又结束了“猪仔”制呢？南非也亟需中国劳力，为什么也停止输入“猪仔”呢？后来由英国政府运去的契约华工到那边不久便都陆续运回中国。

我认为，在探讨这问题时，有一个极为重要而又往往被忽视的因素，就是契约华工的反抗斗争，包括怠工、破坏、逃亡、暴动等各种形式的斗争，也包括同当地人民联合起来所进行的斗争。契约华工制从它产生的时候起，便不断有契约华工的反抗。契约华工制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契约华工的斗争史。到了这个阶段，契约华工的斗争比过去更激烈了，更频繁了，规模更大了，并带有新的特点。因此它在打击契约奴役制中所起的作用，比过去

更大了。以古巴来说，在独立战争爆发前，契约华工曾不断反抗。1868年到1878年爆发了第一次独立战争，古巴的契约华工大批地积极地参加了革命斗争，与其它各族人民一道，流下了无数鲜血，猛烈地冲击了西班牙殖民统治，从而也猛烈地冲击了殖民者实施和维护的“猪仔”制。在战争过程中，许多“猪仔”已经自己解放了自己，糖厂蔗园纷纷倒闭，西班牙人也无法恢复战前状态，“猪仔”的输入也就停止了。又如秘鲁，契约华工的反抗也从未停止过。特别是1872和1876年两次大规模起义，与军警展开血斗，严重打击了契约奴役制。加上秘鲁与智利战争，政局动荡，智利所产的硝石肥料又夺去秘鲁鸟粪肥料的国际市场，1876年后秘鲁便停止从中国贩运“猪仔”了。南非契约华工的斗争也是十分激烈的，并与印度人、黑人等各族阶级兄弟互相支持，迫使英政府于20世纪初年陆续将尚未期满的契约华工遣送回国。

与此同时，国内沿海人民反对“猪仔”制的长期斗争，也给清政府以很大压力，并与国外契约华工的斗争互相支持，更加强了反抗的力量和影响。

正由于契约华工进行各种形式的反抗，使雇主不能随心所欲地剥削和压迫，在一定情况下，使用契约华工不比使用自由劳工带来更大的利润，加上一些地区经济情况的变化，劳力供求情况的变化，产品销售市场的变化，遂使契约华工制从整个说来有开始转向衰落趋势。必须指出，这里所说的开始衰落，是从总的趋势来说，但各个地区政治经济情况不同，其发展变化也很不平衡。在个别地区，这时期，契约华工的输入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有些增长。但这是属于例外情况，不能代表总的趋势。此外，“猪仔”制虽已受到严重打击，却并没有结束。唯利是图的殖民者在订约时可以信誓旦旦地表示决不参与“卖猪仔”，可以表明澳门不准运出“猪仔”，可以宣布要派员调查来新加坡的每一契约华工是否出于自愿，不过公告与表态是一回事，实际干的又是一回事。在这阶段，“猪仔”制最猖獗的时期虽已过去，但还以偷偷摸摸的形式继续着。要结束“猪仔”制，还需要一段时间，还需要继续给以打击。

四

从20世纪初年到二十年代末，是契约华工制的第四阶段，也是最后一个时期。

在这阶段，契约华工出国人数继续下降，上文提到的1876—1900的25年中出国契约华工为750,000人，而1901—1925的25年中则为650,000人。而且在这25年期间，愈到后来，人数愈少，1925年以后，那就更少了。以地区来说，西印度群岛、南美、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加拿大等，已没有契约华工入境。1900—1914年，去马来亚的契约华工为125,000人，平均每年为8,930人。而1915年以后，马来亚已基本停止契约“华工的入口”，去印尼的契约华工还是不少，但也有减少的趋势，1925年以后，则更少了。

二十世纪初期，有个重要特点，即外国政府招募的契约华工数一时猛增。英国在烟台、秦皇岛共招了55,000名契约华工到南非德兰士瓦。1903—1912年，德国从广州、青岛招了七批契约华工共2,200人到太平洋的西萨摩亚岛。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后勤劳力严重不足，英法通过北洋军阀政府按1904年招工章程条约招契约工，英国招了十万名，契约年限三年，法国招了五万名，契约年限五年，大部分送到欧洲战场作后勤劳动，也有一部分送到工厂。法国所招契约华工中还有一部分送到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从事农业劳动。外国政府招募契约

华工，形式上与贩卖“猪仔”有区别，因为它得到了中国政府的同意。契约华工也非绑掠而来，没有经过“猪仔”馆的贩卖，但在实质上并无多大差别。外国政府并没有真正按照合同执行，契约华工不仅出卖血汗，有的还为战争送了命。

这时期，外国政府大量招募契约华工，能否表明契约华工制并不是处在末期呢？我认为，总的来说，契约华工制是到了结束的时候了。因为：第一，如上述，出国契约华工总数是大大下降了，许多地区不再入口契约华工了。第二，从1901至1925年65万出国契约华工，外国政府所招募的竟占三分之一强，这是自从契约华工制出现以来从来没有过的现象，这种特殊的现象，正表明契约华工制由民间进行的正常过程，到此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即契约华工制快没落了。第三，主要是由于世界大战爆发等特殊情况，而且为时短暂，它是特殊的暂时的因素，战争期间英法政府的招募便是外国政府最后一次在华招契约工。1914年6月30日英属马来亚，全境同时废止契约华工制，惟吉兰丹得延期至1916年6月30日。其它地区比马来亚更早废止了契约华工制，只有荷属印度尼西亚拖得最久。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还有几万名契约华工，不过只能说是契约华工制的残余了。

由于契约华工的斗争，国内国外广大人民的斗争，加上当地政治经济和社会形势的变化，经历了一百二三十年的契约华工制，终于走完了它的历史进程。

一百多年来，先后出国契约华工总数约三百万。他们忍泪离开了家乡和亲人，飘洋过海，迢迢万里。他们足迹所至，遍及各大洲。他们到的是荆棘蒿莱之区，深山僻壤之处。他们栉风沐雨，披星戴月，在最艰辛的条件下劳动。他们没有人身自由，其地位之低，受迫害之烈，生活之惨，实与奴隶相差无几。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开辟了多少的种植园，开采了多少的矿山。东南亚的锡矿、烟园、橡胶园，西印度群岛的蔗园，秘鲁的鸟粪矿区，南非的矿山，澳洲的金矿，美国横贯大陆的铁道干线，……那一处不是靠契约华工的血汗以至付出了他们的生命所开发的！梁启超曾引用过美国议员摩顿在参议院的讲话：“近者太平洋沿岸该省利源日辟，需用劳佣亦日多，然所以致此之由，实前此藉华人之力有以启辟之，其功决不可没。”^⑩不独美国如此，前述其他地区也是如此，华工的贡献甚至还要更大。这是谁也不能抹煞的历史事实。

①福建晋江石狮蔡氏族谱，见“晋江专区华侨史调查报告”，厦门大学学报，1958年第一期。

②H·B·Morse,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 trading to China* 卷二，页421。

③管理华侨的官职。

④H·B·Morse, 前揭书，卷二，页427—428。

⑤H·B·Morse, 前揭书，卷三，页17—18。1805年东印度公司所属威尔斯王子岛（属庇能）的长官给印度总督的信。

⑥H·B·Morse, 前揭书，卷二，页427—428。

⑦薛福成奏折，见《清季外交史料》第八十七卷。

⑧⑩梁启超：“记华工禁约”，见《反美华工禁约文学集》，页505、509。

⑨美国驻厦门领事致兴泉永兵备道的照会，见《美国迫害华工史料》。

⑩John·W·Foster, *American Diplomacy in the Orient*, 页280。